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## 鱼生

和多数人的预期相反，我是个生活上特别没有嗜好的人，没有任何的特点，也基本看不出什么活力。谁从我身上看到衣食住行的特征，相信我，那都属于身边人，我自己根本无所谓。谁在身边，我就和他一样。如果要上食材上打比方，我就是那种特别没有味道的东西，例如年糕、土豆、粉丝、高压馒头、白切片土司，反正差不多，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。所以我经常对刚认识的朋友说，我是个没意思的人，特别乏味。

我出生在医生家庭，一日三餐简素洁净，力求减少油盐糖对食物的影响，所以高中大学阶段，像贝克汉姆之正室。后来身边有了女孩子，人家怎么吃，也跟着怎么吃，有的女孩子不吃生东西，好，我也不吃；有的喜欢火锅，没问题也可以接受；有的能痛饮，有的滴酒不沾，有的喜欢水果，有的喜欢吃乳制品老也不断奶，反正只要是在接受范围里面，我都是人云亦云地跟着吃东西。

后来搬去南京，住在朱新建家里，那么他是个大艺术家，纵横三十来年的豪强，吃上面也特别，他非常着迷日本鱼生。随便什么料理店，大小不论，只要有刺身，海胆，七七八八的生鱼片，他都要挑最大份的上，然后埋头猛吃，间歇对我告白：啊我，就是一个极欲主义者。极欲主义这个生僻的词，除了他以外，在别人那里我没听到过，估计寻常画家，也想不出来。

后来朱新建生病，躺倒一阵子，我回上海在作家协会资料室里翻书，就认识了现在身边的女孩子，在吃上的另外一位极欲主义者。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喜欢吃生东西的人，塔塔，西班牙橡子后腿，蚝，Royce 巧克力，我们自己在家煎牛排，都很少有超过一分三十秒，当然，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生鱼片。

生鱼片和寿喜烧这类东西，对了还有山药泥拌饭，让我有回顾历史的闲情，觉得日本是一个贫穷了四千年的可怜地方，所以饮食上才这么乏善可陈。当我国在北宋的时候，基本已经解决了所有食不厌精的技术难题，日本大概只好从遣唐使的书面记载上上过过瘾，精神会餐一把。后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儿，日本料理店从虹桥开到大连杨浦，转眼间人人都开始吃日本料理，穷人的生活习惯被精致化，仪式化了。

某一个雨天，中秋，我们两个在新鲜馆买了一堆生鱼片，找了棵桂花树躲着大嚼，后来这就成了惯例，我们不再挑选日本料理店，而是直接找最新鲜的超市，买上一堆就地解决掉，有家新开的日本百货公司，每周末会请个日本师傅，当场解一条挪威金枪鱼，就会有大脂、中脂这类最为极欲的食材，包装在小盒子里，贴个很贵的标签卖给发烧友。大脂，toro，是这么拼写的么？这东西真是诡异，拿在手里满把的鱼油，又腥又滑，简直是一块深海中的肥肉，可是置入口中，它的一部分几乎要融化了，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坚持着横贯在整个组织纤维中，像柯南这样十年长剧主线剧情一样，令人难以忽略。

我又要去北京三里屯找朱爷新建聊天去了，他现在不能去日本，可惜。他对极欲主义的最好解释就是在冬天的北海道，泡在温泉里，手旁是热的清酒，和牡丹花一样摆放的鱼生。现实情况是，阿诺，当年在接到日本东京歌舞伎听一番街请他开展展邀请以后，没多久，亲爱的朱爷生病倒下，至今没有完成他这个心愿。读者诸君，你喜欢吃生东西么？乘着有机会，照上述做法，天冷了，去一次北海道吧，我替朱爷祝福您。

元旦才过去几天，新年倒计时的欢呼还余音在耳，这个时节聊电影，不免让我生出些许好奇：过去的上海人在新年里看过哪些国产影片？他们又是上哪几家影院看的这些片子呢？

正好手头有些资料，于是一通翻检，稍稍有了点概念。

直至1921年，上海方开始有批量地摄制影片。在此之前，国产电影的生产尚不成规模，一年也就寥寥三五部，有的年份还根本没有拍摄的记录。因而，从1922年开始，上海观众才有每年年初看国产片的记录，这年的1月23日，在上海首映的国产新片，是但杜宇导演的《海誓》，由他创建的上海影戏公司出品，首映影院则为西班牙裔商人雷玛斯经营的夏令配克影戏院。次年，1923年的1月，首先和沪上观众见面的国产片是明星公司的短片《两人》，时间为1月4日，地点在宝昌路贝勒路（今淮海中路黄陂南路）的中国艺术会场；而到了26日，明星公司郑正秋编剧、张石川导演的《大闹怪戏场》就在夏令配克登场了，同时在该

我家小儿未上幼儿园时，有一次与同事的儿子一起玩。两小儿促膝搭积木。同事的儿子似是把玩事业，始终保持沉默，一脸深刻，很是酷派。我家小儿却时不时地发出一些不明所以的呢喃，欲与玩伴交流的意思，玩伴并不搭理，又发出自我解嘲的嬉笑。

同事说：你家儿子很滑稽哦！时隔多年，小儿已长成少年。每遇我沉默无语，他便会与我搭讪说笑话，偶尔好笑，大多无话找话，无聊的样子。过后问其为何如此？他淡然一笑：妈妈咬嘴唇了。此话似是随意，而我听了，却忽觉心痛不已。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亦是敏感到嗅出父母的情绪而替成年人无端操心。父亲为何一下班就捧着书看而不似平时那样谈笑风生？母亲为何整日坐在缝纫机边干活不说一句话？便找寻着话题去打扰父母，目的是为

更多地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，或者，让父母为解决我的问题而从不良的情绪陷阱中摆脱出来。他们的好几次冷战，就在我的插足下偃旗息鼓，不了了之。父母每说起此类往事，旨在赞扬我从小就聪敏细心，而我却常常害怕提到这样的话题。其实，小小心灵受创的感觉，留至今日，依然隐隐犹痛。自然已经遗忘彼时用了什么方法克制某种无以名状的恐惧，而仿若无事地在父母面前说这说那，甚至故作无知状、开心状、傻妞状……看似胡言乱语、一派天真，发现内心煎熬着，暗暗察言观色，实现阳光照耀父母的容颜，才窃窃欣喜而放下下心来，真正用心良苦。

长大以后，父母再发生唇齿磕碰的事，我就是当仁不让的裁判了。说理、劝导信手拈来，也有子弟讲授中文，然后再到法国勤工俭学。但是，他到达南洋，在马来西亚认识了湖南的陈乃蔚女士，在一起创办柔佛巴株巴辖的爱群女校时，相爱并结婚。1927年7月，泰戈尔到东南亚演讲，谭云山在新加坡认识了泰戈尔，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当时，国际大学正缺中文教师，应泰戈尔邀请，谭云山前往印度国际大学执教，开始与泰戈尔亲密共事15年。他以“湖南牛”的蛮劲儿，在泰戈尔身边刻苦学习，终于成为泰戈尔研究的专家，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，成为“现代玄奘”，不但与泰戈尔，而且与“圣雄”甘地、尼赫鲁等印度领袖有着亲密的关系。

## 泰戈尔给他取过名

王登令

朝大诗人王维的字叫“摩诘”，他是把印度佛教神话人物“维摩诘”风趣地拿来做事的。谭中教授在研讨会上，很为父亲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感到骄傲。是的，这的确是很值得自豪的。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早就说过：“谭云山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印两国的领袖都有深厚的友谊，是沟通两国的‘金桥’。”

谭云山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，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。毛泽东比谭云山大5岁。谭云山很敬重学长毛泽东。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，他马上跟着参加；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，他马上也跟着到船山书院进修。毛泽东在湖南发起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。谭云山选择了另一条前进之路：先到南洋为那里的华人

## 快乐者的忧伤

薛舒

能力时的无奈和恐慌。我，亦是如此。直到儿子说：妈妈咬嘴唇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轻易咬嘴唇，是因为我家的这个少年，他知道我的牙齿和嘴唇之间用力的触碰，是某种坏情绪的流露。他敏感如此，让我忽觉心疼与自责。当一个孩子表现出活泼天真、无忧无虑时，我们是否想到，他们快乐的表面之下，也有他们的恐惧和忧伤？我们总是以为，孩童的心，应是简单无邪，却不知他

们亦是有着我们曾经有过却已遗忘的创痛。孩童如此，成年人也一样。未必开朗者即快乐者，未必欢笑者即幸福者。有人爱说笑话，爱幽默一把，是为了周围的人开心而笑。这个人，往往被定论为一个开朗的人，一个少有忧愁的人。很少有人想到，制造快乐的人，内心淤积的伤怀，相比整日忧虑愁苦的人更加繁重。

我想，每个人的内心都由一半快乐和一半忧伤组成，只是，有些人隐匿快乐，示人忧伤；有些人却收藏忧伤，表达快乐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人的内心究竟是快乐多还是忧伤多？答案正与他的表现相反。

你更愿意把什么给予他人，把什么留给自己？现在，我要真诚地向那些快乐的人们致以敬意，因为我相信，他们是把痛苦和忧伤，悄悄地收藏在了自己的心里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招投标一景：招是明的，投是暗的。

年谭云山和妻子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返回印度国际大学。将大果子谭中和二果子谭正留在中国。谭云山将孩子称为“爱之果”。这大果子和二果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回印度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谭云山得悉他一直崇拜的学长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，在印度写下动情的诗篇：“衡岳崔巍灵秀钟，三相七泽多英雄；美人香草今何在，海角天涯古国中。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思念。毛泽东回想起来以后，热情邀请老同学回国观光。在全国政协二届

三次会议上，谭云山当选为特邀委员。这位为中印人民的友谊作出杰出贡献的泰戈尔朋友、毛泽东同学，于1983年在印度菩萨伽耶住所病故，终年85岁。他是值得中印两国人民永远怀念的一座不朽的“金桥”。

## 元宵灯谜

程国泰 痴迷围棋，结为伉俪（五字电视剧）

昨日谜面：高卢军团（三字沪语称谓）

谜底：老法师（注：别解为“昔日法国的部队”）

违法搭建，毁绿建房，排污不断，当受害群体举报和投诉时，有关部门的回答是：正在“走程序”。一推了之。

所谓“走程序”，即发现问题的部门（如物业）无执法处置权，需一级一级向上报批，以获执行的批示，其过程就是“走程序”。很多案例显示，由于时间的拖延，有时问题越发严重，新的问题又在产生，使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。

对有关部门习以为常的“走程序”应该议一议，剖析一下：

其一，制度的缺陷。发现问题的基层组织掌握处置问题第一手材料，最易解决，却不能行使执法权，必须上报“走程序”。由于层层审批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对解决问题无实质性的推动，相反，延误最佳及时处理的时机，星星之火不灭，变成大火再救难度可想而知，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对此，从实际出发是否可修正某些

规章制度，下放执法权，使基层管理部门发现问题即能及时解决。如果一时难以做到，也必须精简审批环节。

二、推诿的借口。有关部门一旦上报“走程序”，不管何时下达执行的决定，无时间约束，其可不管，即使面对深受其害的百姓质问，往往用“走程序”而推诿。面对需及时

处理的事件无动于衷，让自己的不作为披上无责的外衣而心安理得。你在火里，他在水里，有了借口可以更慢慢来。

第三，滋生官僚主义。明摆着事实清楚应及时解决也可处理的问题，进行所谓的必需的公文旅行，上级只凭书面报告作形式上的原则批示。一级一级的批示，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手续而已。“走程序”使官僚主义合法化。

“走程序”从某种角度讲，就是上述不良作风的产物。改革大潮应对“走程序”冲一冲了。



## 夜光杯

汤惟杰

前，柳氏兄弟在南京的新街口经营的一家影院——“世界大戏院”，就以放映国产片著称。在上海的金城大戏院仍然以国产片为号召，1788个座位的容量，以及良好的设施，使其一跃而居国产片的头把交椅。1936年1月1日，选择“金城”首映的，是艺华公司的《凯歌》，该片由田汉编剧，导演则为

卜万仓。

1937年的1月，沪上有多部国产片面世，元旦这天，派克路（今黄河路）的卡尔登大戏院首映黄嘉谟编剧、方沛霖导演的《化身姑娘（续集）》；一周后的8日，新光大戏院（宁波路）公映联华公司的集锦式故事片《联华交响曲》，由8小段故事集合而成；而金城大戏院中，新华公司吴永刚导演的《壮志凌云》正在热映；15日，明星公司的《永远的微笑》（刘呐鸥编剧、吴村导演）也正式在“金城”首映……

写到处此，正好从网上扫到一则中国电影市场的利好消息：2013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217.69亿元，其中国产影片市场份额高达58.65%，创下近年来历史新高。赶紧地，查排片表找部国产电影来看吧，当然前提是，要好看。



## 七夕会

影音方圆